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指導老師：巫麗雪

不想讀書！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關連性：

以 TEPS 調查為例

“Studying is not on my Roadmap!”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ities and Behavior
Problem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TEPS

學生：黃靖翔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

天主教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學士論文

不想讀書！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關連性：

以 TEPS 調查為例

“Studying is not on my Roadmap!”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ities and Behavior
Problem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TEPS

學生：黃靖翔撰

指導老師簽名：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十月

系所章戳：

謝辭

「如果你不能自由的講，你就不能自由的想。你我應該自由的講：不迴避、不遺漏、不嫌麻煩的講，然後才能找出講不通的事；自由的講，除了講是非還要講出創傷、爭議和矛盾。因為，那些避而不談、隱而不宣的，正是我們害怕但卻終究必須去想的事。」這是前大法官許玉秀曾經說過的話語，是我從高中至今不停堅持的信念。

一路走來，謝謝團契社的伙伴引領我進入善的領域，使我體會何謂純真的善；謝謝水溝社的伙伴，使我學會如何以各種方式反抗體制；謝謝 ALSA 的伙伴，使我理解體系規範下的實際操作。這三種概念相互衝突著，也相互融合著，因為人生就是在衝突與矛盾中尋求自我道路的一段旅程，因此我得要先感謝曾經參與過的社團帶給我的人生體驗，豐富了我的大學經歷，增廣我對人生旅程的觀點。

再者，我要感謝麗雪教授當初選擇了我成為他的指導學生。說實在，當初面談僅寄信給他時，我是抱持著被刷下來的勇氣為我的人生賭一波，然而在面談完我就覺得自己真的完蛋不該賭的，認為自己持續出錯，肯定被刷下來，可卻沒想到我的運氣居然發揮作用，就這麼的正取了。在之後的討論過程中，教授也細心為我指導論文的寫作，補足我在量化操作上的不成熟之處，即便我問的問題可能再基礎到不行，教授仍然有耐心且溫柔地引領操作，學生我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最後，依舊要謝謝一路上曾經相遇的人，以及現在所擁有的一切人事物，謝謝我的朋友，謝謝我那稍微複雜的家庭背景，謝謝誤打誤撞就讀社會學系的自己，謝謝能夠雙主修的時刻，尤其，謝謝在我人生如同貶謫般遭遇時突然出現的 YS，讓我相信平淡安穩的生活態樣是有可能存在的，即使我們最終的道路仍是未知，但願我們可成為林宥嘉〈兜圈〉裡所訴說的，繞了一圈後仍認為彼此才是那個唯一的溫柔鄉，真正實現在你想念我時所聽的〈想你的習慣〉以及我想念你時曾被你笑過的歌〈Carry U〉，畢竟那象徵著我們共同的學校生活。

「來回走過這麼少的路，卻犯下這麼多的錯誤。」就因為我們的人生總會犯下許多的錯誤，所以我們必須耗費一輩子去修復以往的經歷，不迴避、不遺漏、不嫌麻煩的講，因為，那些避而不談隱而不宣的，正是我們害怕，但卻終究必須去想的事，往好處想，走過這麼少的路就能發現自己很多的不足，自己所付出的成本其實很小呢！那這樣剩餘的精力，就能專心去面對或甚至治癒自己的是非、創傷、爭議與矛盾了。

摘要

「童年逆境」的相關研究已經指出，童年時期的不幸經驗對人生後期有深遠的負向作用，但國內相關研究較多著眼於童年逆境的心理後果，較少探究對青少年行為問題的影響。另一方面，國內研究也甚少討論童年逆境與青少年行為表現之間的連結機制。本文在此基礎上，試圖指出童年逆境如何影響問題行為，討論不同童年逆境經歷（目睹暴力、經驗暴力、處於無形家庭壓力）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作用；以及在反學校文化的討論框架下，指出次文化的源頭可能起因於對教育典範的不理解與衝突，藉此討論反學校文化在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之間扮演的角色。換句話說，本研究特別關注具有童年逆境經驗的青少年，試圖探究他們在青少年階段的行為表現是否異於一般的青少年？若有，反學校文化的影響機制為何？本研究透過次級調查資料《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的高中職、五專學生調查資料為基礎（第四波調查），合併第三波的學生行為相關資料及第三波家長問卷中的家庭背景資訊，來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本文的分析結果指出，三種不同的童年逆境顯著影響著青少年的偏差或違法行為，而反學校文化則部分中介童年逆境的效果。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童年逆境影響青少年問題行為上具有些微的性別差異。

關鍵字：童年逆境、問題行為、反學校文化、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

Abstract

Research on "childhood adversity" has revealed that unfortunate experiences during childhood have long-lasting negative effects on later life. However, in Taiwan, most related studies have focused more on th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less on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 behavior problems. Moreover, there has been little discussion about the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adolescent behavioral performance. This study aims to identify how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such as witnessing violence, experiencing violence, and being under invisible family pressure) affect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Based on the frameworks of counter-school subcultu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rejection of educational paradigms by counter-school subcultures is influenced by their self-expectations, which further harms adolescent behavior.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 specifically the follow-up surve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modules in 2005 and 2007 TEPS,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adolescent deviant or delinquent behavior. Furthermore, counter-school subculture partial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adversity on adolescent behavior.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found that childhood adversity has slight gender differences in its impact on adolescents' behavior problems.

Keywords: childhood adversity, behavioral problem, counter-school subculture, TEPS

目次

壹、緒論.....	1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1
(一) 研究動機.....	1
(二) 研究目的.....	2
貳、文獻探討.....	4
第一節、童年逆境作為累積劣勢的啟發器.....	4
第二節、反學校文化機制建立起教育無功能的價值.....	4
第三節、青少年問題行為的自我預言實現.....	6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8
第一節、研究資料來源.....	8
第二節、研究對象.....	8
第三節、研究架構、研究假設與分析方法.....	8
(一) 研究架構.....	8
(二) 研究假設.....	9
(三) 分析方法.....	10
第四節、變項之定義與測量.....	10
(一) 依變項：問題行為.....	10
1. 偏差行為.....	10
2. 違法行為.....	11
(二) 自變項：童年逆境經驗.....	11
(三) 中介變項：.....	11
1. 基本教育典範認同度.....	11
2. 反學校行為.....	12
(1) 逃避學校.....	12
(2) 奇裝異服.....	12
(四) 控制變項：.....	12
1. 性別.....	12
2. 家庭經濟.....	12
3. 父母教育程度.....	12
4. 自我學習動機.....	12
5. 自我教育期望.....	13
肆、研究結果分析.....	16
第一節、研究結果.....	16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單變項分析.....	16
(二) 描述性統計分析：雙變項分析.....	16

1. 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	16
2. 童年逆境的性別與家庭背景差異.....	17
(三) 多變項迴歸分析.....	18
1. 青少年偏差行為.....	18
2. 青少年違法行為.....	21
3. 不同性別導致之問題行為差異.....	24
伍、結論與檢討.....	26
第一節、結論.....	26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27
陸、參考書目.....	29

表目次

表 1	分析變項的描述性統計 (N=13,680)	14
表 2	各變項間之皮爾森相關矩陣.....	15
表 3	童年逆境之性別與家庭背景差異.....	17
表 4	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N=13,680)	20
表 5	青少年違法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N=13,680)	23
表 6	男性與女性青少年問題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25

圖目次

圖一	研究架構.....	8
----	-----------	---

壹、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筆者於就學過程當中，身旁的人總是不斷地提醒我們考上好高中及大學的重要性，若未能考上就乾脆棄學去「做工」。除此之外，學校的活動（話劇比賽、朗讀比賽等）幾乎是根基於不妨礙讀書學習的情況而舉辦，對讀書不感興趣的孩子而言，學校彷彿成為其痛苦的枷鎖，但又因家長期待小孩透過讀書獲得一番成就而遵從學校決定的現實，在就學過程找尋不到支持其讀書的動力，使得他們更認為讀書是件「沒有用的事」，而對讀書產生迷茫感，但迫於家庭與社會期待的壓力，只好待在教育體制中混文憑、過一天算一天。不過，這群對讀書不感興趣的孩子會試圖在學校裡找尋樂子，以度過學校的無趣時光，並非僅有專心上課的選擇。就筆者的經驗而論，在尚未進行成績分流的國中階段，對讀書不感興趣的孩子常會試圖和教師聊天，消耗上正課的時間，轉而讓這些被消耗的時間變得有趣，或是上課途中與同學忘我聊天，干擾上課秩序，亦或是「找尋更多的樂子」，例如帶榔頭拆課桌椅與在桌子上釘釘子、上課與同儕打牌、帶刀向同學展示、翹課、與師長及「好學生」產生嚴重衝突和打架滋事等。其中，筆者身為「好學生」的一員，也曾與其產生衝突，後來從導師那得知他們承擔著比正常家庭小孩更為沉重的經歷，如他們歷經父母離婚、經濟困難、管教不當、父親為犯罪者等，這些負面事件可能導向其走向不一樣的人生路徑。這些回憶與自身經歷開啟了本研究的緣起。

經過學術/職業教育分流的考驗後，於筆者就讀的高中（中間偏上）極少發生類似上述的事件，大多數同學理解社會、家庭對自身的期待而試圖專心上課，準備段考及考上好大學，且學校體系也以嚴格的方式對待學生，但仍有少數同學落入「不想讀書」的情境，懷疑「讀書就有好未來」這件事是否正確，而陷入迷茫，甚至焦慮不斷。他們之所以落入不想讀書的狀況，可能有著眾多因素在其中運作。「不認為學校教的知識在現實會用上」、「教師管太多且多為負面批評」與「聽不懂上課在說什麼」係筆者最常聽見的答案，這導致他們對未來的想像是低落的，認為從事勞力活是命中註定，師長也會認為他們無法就讀好的大學，而要他們思考「不一樣的路」，使得他們傾向將標籤貼在自身的情形，並逐漸對讀書不感興趣，轉為認同實際能在現實派上用場的知識。

在此，筆者對這些經驗觀察產生好奇，試圖想理解高中職階段裡，不同家庭經驗的青少年在面對學校教育的知識傳遞上有何差異？對於學校安排的反應為何？這些對學校體制的反應差異是否進一步產生「反對學校觀點」次文化，從而導致問題行為的產生？學校作為具有權威的教育機構，當家庭無法成為青少年的避風港時，學校必須適時介入輔導，藉此彌補部份家庭難以實踐的關懷與輔導，被期待教育學生能有良好的作為與成就；換言之，學校可能減緩青少年在家庭生活面臨的各項危機帶來的衝擊。若以近幾年受到普遍討論的學術概念—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來說，這些青少年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不斷遭受成長逆境，且其困境無法在原生家庭中透過適度的支持系統獲得妥善的照顧與養育，可

能可以透過學校的輔導機制盡力消化其在家庭成長過程的不愉快。根據張如欣（2011）的研究指出，學校的氣氛、師生間互動、人際互動等因素影響著青少年對學校系統的信任，使之傾向依附與否，而青少年愈喜歡學校，則其從事問題行為的風險會降低許多。反之，若學校無法成為青少年的支持者，深處其中的青少年愈不信任學校制度，且反抗師長的現象也愈常見，其從事問題行為的可能性也愈高。

上述這些個人的觀察與張如欣（2011）提供的資訊，讓筆者不斷地思考，這些無法消化家庭不愉快的青少年，若到了學校無法受到師長歡迎與信任，可能在學校更加強化其負面經驗，且又於讀書上遇到阻礙，導致其認為學校是個無趣的地方，對自我期許逐漸降低。這些不友善的情境可能使青少年轉而向具有相同情緒或經驗的同儕靠攏，增加反抗師長並從事問題行為的機會。總而言之，本研究認為學校作為青少年的第二個成長場所，其正向或負向的觀念深刻影響青少年從事問題行為的樣態，若具有童年逆境經驗的青少年在學校獲得支持，是否能改變他們看待整個世界的態度？反之是否又加重了不幸的家庭經驗？這道疑惑開啟了本研究開展的契機。

（二）研究目的

面對這一個有待探究的課題，筆者從「童年逆境」的相關研究著手，童年負面經驗已經被指出與兒童、青少年與成年期的一系列困境相關，如憂鬱、自殺行為、行為問題、焦慮、與健康等（Jacobs et al., 2012），然而國內相關研究比較著重於探究童年負面經驗對於後續心理健康的作用機制，釐清不同童年負面經驗的痛苦差異所導致的心理機制結果（常心怡、宋麗玉，2010；陳杏容，2021；陳杏容 & 陳易甫，2019；陳毓文，2008），較少聚焦於探究青少年的行為問題¹。在這些基礎上，本研究將著重於青少年的行為問題，連結童年逆境經驗與行為問題，探究其行為問題上是否因童年負面經驗而有所差異。一方面，探究童年逆境的不同面向與程度將如何影響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另一方面則聚焦於探究反學校文化在其中的連結機制。

在少數的研究中，Willis（1977）指出工人階級子弟繼承父業的關鍵機制，在於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學生洞察了「認真讀書即能成就」的謊言，因此不願交付被控制權，而產生了反學校的文化價值與行為。在這研究中 Willis 看到家庭背景與反學校文化與學生行為之間的關聯，另外亦有研究看到城市與鄉村家長對孩童的期望差異，或是學生與教師之間的權力平衡（黃庭康，2017；Liu & Xie, 2016）等。整體而言，較少探究家庭內部衝突、家庭重大變故及嚴重負面事件如何造就青少年反學校行為，進一步再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本研究認為童年逆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青少年對學校制度的信任程度，青少年在經歷一定的童年負面事件後，帶著早期在家庭中的社會化結果，進至學校，藉由學校環境、同儕團體、師生互動與學習成績的相互作用，逐漸區辨出誰是學校與老師心目中的「好孩子」和「壞孩子」，形塑青少年對於自我與團體的認同，走向願意迎接且符合他們本身價值觀的團體（Brumley et al., 2017; Trinidad, 2021）。

¹ 不過，目前已有少部份研究著重於物質濫用的探究（李佳桂 & 馮瑞鶯，2020；陳杏容 & 陳易甫，2019）。

總而言之，在這些知識基礎上，筆者漸漸聚焦並提出一些可能的研究方向：經歷過童年逆境的青少年，他們在家庭裡已經遭遇許多不堪經歷，進入學校又可能承受更多的心理壓力（陳毓文，2008），具童年逆境青少年在面對具操控權力的學校場域上，是否比起未經歷過童年逆境的青少年更容易經歷反學校文化的過程？若有，他們是否會於反學校文化的作用下更容易從事問題行為？基於上述的個人經驗與學術思考，本研究因此特別關注童年逆境經驗對青少年行為問題的影響機制，以反學校文化為理論概念，探究青少年對學校強調以控制換取成就的教學典範、對學校的認同、對學習的認同等機制，在童年家庭負面經驗與問題行為之間起著何種作用？進一步地為過往研究成果增添理解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知識。因此，本研究將透過次級調查資料《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的高中職、五專學生調查資料為分析資料，以第四波調查的樣本為基礎，連結第三波的學生行為相關資料及第三波家長問卷中的家庭背景資訊，來回答上述的研究議題。

貳、文獻探討

第一節、童年逆境作為累積劣勢的啟發器

童年逆境 (ACE) 泛指對兒童的身心健康構成嚴重威脅的各種情況或事件，包含急性創傷與慢性常規壓力兩種不同的類別 (Brumley et al., 2017; Trinidad, 2021)。前者通常指涉孩童於家庭成長環境當中遭遇虐待、侮辱、從事性交易等非法行為，這種經歷往往會為孩童留下龐大陰影，於後與人相處時易不信任他人、對環境充滿敵意，需要耗費較多心力復原心理陰影 (沈瓊桃，2010)；慢性常規壓力是指漠視、言語貶低、過於嚴格等而使孩童形成自信低落或較敏感之性格。不論前者或後者都使處在這種情境中的孩童持較為負面的想法、甚至產生憂鬱 (常欣怡、宋麗玉，2010；陳毓文，2008；林恩霓，2021)，常常必須透過自我修復及社會支持來面對因此困境而引發的各種負面影響 (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不過也有研究認為童年逆境帶來的陰影難以克服 (白般若，2010)，也可能成為鑲嵌於個人履歷中難以磨滅的印記 (Schafer et al., 2011)。

此外，童年逆境經常發生於社經地位弱勢的家庭 (參照 Brumley et al., 2017 的文獻回顧)，弱勢家庭背景下的孩童於家人高工時、低薪資的情形下，從事任何決定前，皆須考量到家庭的經濟狀況與資源的取得難易度，即便孩童申請學校或社福團體的補貼或獎學金，也可能因制度的缺陷 (如家庭狀況瀕臨貧窮線) 而無法獲得保障。面臨社會制度也無法救濟家庭狀況的孩童，逐漸產生「靠自己」的理念方式，選擇出外工作以貼補家計，犧牲掉了孩童放學後的休閒時間，也減少與同儕互動的頻率 (陳杏容，2021)。同時，生命負面事件的持續發生也可能加重孩童身上所背負的壓力 (俞國良、李森，2021)，這些需要宣洩的壓力於家庭內部難以消化，更因孩童與同儕互動頻率的減少或忽略而無法釋放，孩童尋求不到排解壓力的管道，只好累積在內心裡面，久之演變成了健康問題 (陳杏容，2021；陳杏容、陳易甫，2019)。

性別亦是影響童年逆境的發生因素之一。在家庭中，女性較容易受到性虐待與身體虐待上的童年逆境經驗，男性則較容易受到身體虐待與衝突之負面經驗 (洪聖欽，2011；Ida Haahr-Pedersen et al., 2021)。且負面經驗的後續影響也可能具有性別差異，女性的負面經驗較常轉化為心理上的憂困，男性則可能較以外顯的問題行為來展現其困境 (參照王郁琮，2014 的文獻回顧)，甚而童年逆境對於影響晚年面對疾病時的態度上也展現性別差異，女性可能對疾病是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而男性可能較不受影響。(李月、陸杰華，2020；劉霖等，2021)

第二節、反學校文化機制建立起教育無功能的價值

國內外有研究指出，學校成績優劣的影響最主要是源自於家庭 (吳瓊洳，2000；張如欣，2011；Liu & Xie, 2016)。家庭職業功能、父母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地區、鄰近環境等條件控制著青少年的課業表現，隨著年級的增長，家庭因素逐漸成為青少年學業成績的重要指標，中、上階層的父母擁有較多的資本 (capital) 投資於自身孩子身上，他們在課後之餘仍可藉補習班、家教或其他方式增進孩子的

課業，而低階層的父母較仰賴學校教育體制的幫助，兩者所能動用的資本先天上即有顯著差距（陳建州，2001）。此外，男性受到家庭職業的影響較女性多，女性則是被同儕團體所影響（陳建州，2001）。亦有研究指出，孩童的學業成績與階級化的教養模式有相關（陳旺德等，2020），他們透過語言來學習父母的階級價值觀，卻發現與學校使用的言行措辭有著相當出入（陳建州，2001），因而產生不適應感、焦慮感（史家瑄，2008），開始認為學校的教育知識功能是沒有用的、無法在社會上獲得幫助，導致不順從學校教育典範的次文化結果（Willis, 1977）。

反學校文化作為學校內的一種學生次文化（Willis, 1977）。有相關研究看到，勞工階級父母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通常對孩子的感情需求選擇漠視與冷淡、較少或是沒有關心／不在乎孩子的課業，採取較為放任的管教方式，並未對孩子有很高的教育期望。在對學校的看法上，勞工階級的父母大致選擇消極態度面對，不理會學校的活動安排。當孩子無法在學校獲得滿足時，源自於工人家庭的廠房文化提出這些孩子一個可能的出口，他們模仿父母在廠房中的工人階級文化：對制度體系更易有不滿情緒，以反抗、叛逆行為的態樣面對體制（Willis, 1977），例如對於孩子功課量大有所批評、批判教師給的意見並沒有用等，而研究也發現父母若愈攻擊學校，孩子對學校的認同則愈低，孩子就更傾向模仿父母看待學校的態度，對於學校有著不滿，且試圖想要反抗（吳瓊洳，2000；Willis, 1977）。

這些在家庭內被動接受價值觀的青少年進入學校後，將學校視為是一種「與現實社會脫節」的機構，他們認為學校教育的知識無助於勞力活的精進，反而還令自己陷入與團體格格不入，甚至遭遇社會排除的事件（黃庭康，2017），為讓自己試著融入團體當中，他們透過拒絕基本教育典範的方式，即否定師長以向上流動的誘因引誘青少年順從教育制度的方式，親自且自願地斬斷知識與順從的交換邏輯鏈，尋求符合工廠文化的道路。Willis（1977）認為在前述的過程之下，這些擁有反學校文化的「小子們（the lads）」將與師長、學校人員和好學生間的關係形容成「與權威競爭的遊戲」，權威者會試圖引領小子們回歸「正路」，不過也必須和他們進行權威上的討價還價，如課堂制度的自由度等，否則權威者若直接實施強制手段，不與他們進行對價遊戲，他們會認定自身遭受攻擊而施與強度更大的叛逆行為干擾上課秩序，因此師長對於難以控制的青少年會以權力開放的方式與他們協商，試圖維護「好孩子」及自身的上課秩序，相對地，這也令這些小子們擁有較大的自由空間從事想做的事情（Liu & Xie, 2016）。再者，反學校文化的成員知道他們自身能以消過（如愛校服務、口頭訓誡等）的手段除去於學校或社會內所記載的汙點記錄，這使之更忽視教育權威與社會制度，更勇敢違反校規甚至法律（吳瓊洳，2000），相反地，順從體制的成員是小子們鄙視的對象，他們藉由對順從權威者的厭惡，建立起特定人認同的價值觀及間接鞏固反學校文化成員的人生態度。

另外，就性別的因素上，女性因傳統性別觀點的印象，即好讀書、文靜、不能衝突、以他人為導向等特質常被認為係「好女孩」的標準，而男性受性別框架拘束，其成就動機傾向被認為係以控制與自我滿足為導向，傳統觀點將其偏離學校之行為視為是「愛玩」、「男生的調皮搗蛋」的表現，而好讀書的行為被視作是女性化的表現，因此男性較容易比女性從事反學校文化之表徵以維護自身的男子氣概，與

女性特質做出區隔，女性則比男性容易實踐家長與學校教師的學習要求（黃超、吳愈曉，2016），但遭受傳統性別框架限制下，為扮演「好女孩」的女性學生僅能藉由非肢體衝突的方式表現自我的侵略性，難以模仿男性外在的偏差行為來宣洩或嘲弄來獲取自我滿足（楊巧玲，2007）。

第三節、青少年問題行為的自我預言實現

目前眾多的研究指向問題行為的產生是經由敵意環境（家庭、學校）、個人特質（自我期望、對他人的想法）與同儕團體（偏差團體、參考團體）所形成（彭淑華，2006；俞國良、李森，2021；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而童年時期對於個體發展的逆境可能導致後續發展過程中的行為問題，如物質濫用及其他的偏差行為（李佳桂 & 馮瑞鶯，2020；陳杏容 & 陳易甫，2019；Jacobs et al., 2012），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透過低自我期望、或不佳的同儕團體而傳遞。根據緩衝假說（buffering hypothesis）的論點，社會支持將會緩解個體面臨困境時的社會心理壓力，因而增加其克服成長逆境的韌性（Cohen & Wills, 1985），其中，友誼團體被認為是青少年團體最為重要的、提供支持的參考團體。同時同儕團體也對青少年的行為產生深刻的影響，當孩童在青少年時期傾向於更遵守同儕間的次文化價值，一群好的同儕可以防止彼此作出偏差行為，也能夠鼓勵彼此從事正面行為，反之則然，孩童於壓力的作用下選擇適應非常規的生活，進而從事非常規之行為（史家瑄，2008；Costello & Hope, 2016）。

由性別的觀點切入，家庭平時教導女兒必須避開風險，其行為舉止較受到家長及學校較高的檢視，結交偏差行為同儕的機率於是大幅降低，但女性於此過程中較輕易產生負面情緒，其多半是採取舒緩情緒的方式維持其形象，以不輕易被發現的偏差行為，如抽菸喝酒、裝扮突出、考試作弊等方法平衡自我滿足與社會期待；男性由於較傾向與偏差同儕從事偏差行為及喜愛冒險行事，在問題行為的表現上異於女性的短暫性，男性較具有持續性，且從事的問題行為類型多具有攻擊性（陳怡如，2013；林秀怡，2016；吳中勤，2016）。

家庭背景較為弱勢的青少年，他們的學業成績也較為低落，而身為中間人的教師投射出的觀點將造成青少年自評優劣的結果。教師若採取過於放任或嚴格的管理方式，青少年反而會傾向從事問題行為的態樣，於是必須在教學品質與學生反抗間取得平衡，像是以座位安排的方式將不順從的學生集中在最後面，越順從的學生集中在前面，方便管理與分隔學生，使其不受到不順從制度學生的影響（Liu & Xie, 2016）。受到隔離的學生透過成績表現的不如意，認為自己已經無法向上邁進，教師也會對成績不好且品行不佳的學生貼上標籤加以分類，使這些青少年更認為自己不被看好，傾向做出對自我評價較低的判斷，這亦即 Schafer et al. (2011) 所謂帶著過往的負面經驗對自己未來投射較差的預測而導致「結構化的履歷」。被學校貼上標籤的青少年在自我評價低落的情況下，會選擇將同群被貼相似標籤的同儕當作為夥伴，試圖劃清與其他模範學生的界線（Liu & Xie, 2016），落入自我預言實現的情境。而當青少年從事問題行為後，學校的反應會依學生的成績而有差異，表現良好與成績優異的學生做出問題行為後，教育權威會視作是「不小心的」，對其具有高包容力，相反地，表現不良與成績不佳的學生則被視作「不令人意外」的負向期待，

教育權威對他們的行為問題會更加挑剔，他們也因家庭與環境資源的不足，難以擺脫這些負面標籤、擁有機會去緩衝，最終為履行他們的標籤而從事更多的問題行為，滿足無法填補的歸屬感（吳瓊洳，2000；張如欣，2011；盧名瑩，2022；Costello & Hope, 2016；Liu & Xie, 2016）。

由上述文獻可得知，具有童年逆境經驗的青少年於生活上困難重重，除面對家庭內部可能的敵意環境外，更需擔心學校機構、師長、同儕對他們的負面評價，相比正常家庭成長的青少年，有過童年逆境的青少年更敏感於這些危機與環境，他們產生的問題行為值得被注意，因此本研究即是要研究童年逆境青少年的危機與轉向，並融合反學校文化帶來的權威反抗。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一節、研究資料來源

本研究將透過分析次級資料來檢驗本研究的研究議題。分析資料來自於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 (TEPS)，該資料庫係由中研院、教育部、國科會和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共同規劃設計的一項全國性長期調查，每波之調查方式是以問卷方式調查國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學生，再藉由學生家長、老師與學生就讀的學校共四份問卷進一步理解影響學生學習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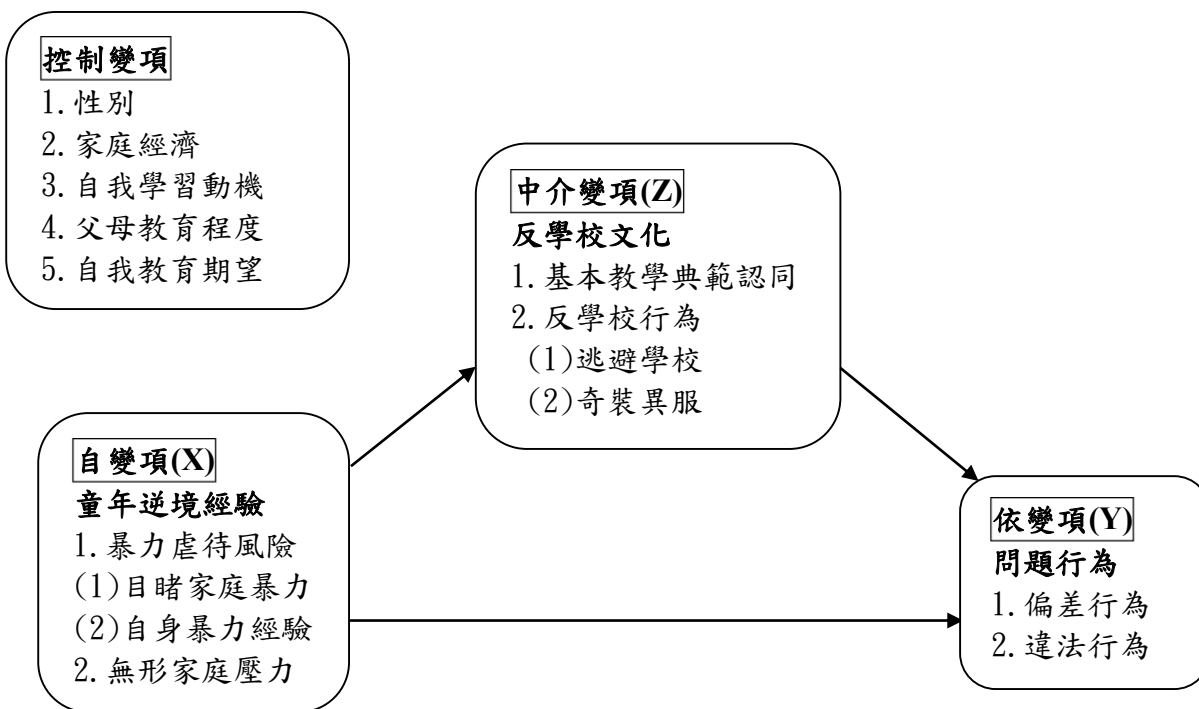
筆者採用的 TEPS 問卷係以高中職、五專學生調查為基礎 (第四波調查，以下簡稱 w4)，連結第三波 (以下簡稱 w3) 的學生行為相關資料及 w3 家長問卷中的家庭背景資訊，釐清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關連性，以及反學校文化等變項在其中的中介角色。

第二節、研究對象

此問卷的母體分別是 94 年與 96 年的全國高中職、五專生，採取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先抽出樣本學校，再從樣本學校內平均抽出 3 個班級，每個班級內隨機抽取 15 位學生作為該調查的訪問對象。w3 共有 15,875 名學生受訪，w4 則有 15,311 名學生受訪。其中在 w3 家長問卷的樣本是抽樣學生的家長，共有 15,353 名家長受訪。在資料整合及扣除遺漏值後，實際納入分析之樣本數為 13,680 名學生。

第三節、研究架構、研究假設與分析方法

(一) 研究架構



圖一 研究架構

(二) 研究假設

根據國內外對童年逆境的研究（陳杏容、陳易甫，2019；李佳桂、馮瑞鶯，2020；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童年逆境經驗愈嚴重的青少年，其給予自身的評價即愈低，他們可能模仿自身在家庭所遭遇之經驗行為，以尋求外界認同。基於此研究，筆者認為不同童年逆境程度之青少年，在對於問題行為上更傾向從事之，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

假設一：童年逆境經驗愈多的青少年，其更傾向從事問題行為。

陳建州（2001）與陳旺德（2020）的研究指出，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與階級化的家庭教養模式有關，高階層的家庭較低階層家庭擁有更多資源培養青少年對教育邏輯體制的認同感，而於 Brumley et al.(2017)研究的文獻回顧亦表明童年逆境較常發生於社經地位弱勢的家庭之中。據此，青少年家庭社經地位愈弱勢，可能經歷過愈多童年逆境，其學業成績愈差，難以藉由學校的知識交換邏輯體系改善自身處境，轉而傾向對反學校文化的認同，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二：

假設二：童年逆境經驗愈多的青少年，其更傾向認同反學校文化之行為

沈瓊桃（2010）與俞國良、李森（2021）的研究指出，敵意環境（家庭、學校）將會致青少年產生壓力，產生逃離環境的想法，或以次文化之打扮消極地抵抗權威，及從事問題行為（吳瓊洳，2000；張如欣，2011；Willis，1977；Liu & Xie，2016）。基於研究發現，筆者認為遵從反學校文化之青少年對於「知識與順從的交換邏輯」體系感到無趣，學校成為無法為其得到幫助的場域，於此條件下，這些青少年開始挑戰權威，穿著不合學校要求之服裝打扮，甚至逃離學校，轉而向外尋求認同，從事問題行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三：

假設三：遵從反學校文化的學生，其更傾向從事問題行為。

綜合童年逆境、反學校文化與問題行為的研究（李佳桂、馮瑞鶯，2020；俞國良、李森，2021；Willis，1977），研究發現經歷生命負面事件的青少年若獲得之社會支持較少，其對自身的自我評價較低且逐漸認同負面標籤，傾向與偏差同儕交往，Schafer et al.（2011）則認為「結構化的履歷」導致這些具童年逆境的青少年為於偏差同儕團體獲得歸屬感與認同感，而開始從事問題行為與提高從事頻率（盧名瑩，2022）。本研究依據前述所及，認為學校能給予具有童年逆境經驗的青少年較多社會支持以恢復其走向正規道路，若學校無法藉由反學校文化之對策使得這些青少年獲取社會支持，則他們從事問題行為的頻率比起未經歷反學校文化的青少年更加頻繁，因此本研究提出第四個假設：

假設四：具童年逆境的青少年透過反學校文化的價值與行為，進而增加其從事問題行為的頻率。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計畫將以量化研究來進行，以期在既有的文獻基礎上，進一步探究童年負面經驗是否透過反學校文化中的「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影響其問題行為的發生，研究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為了先區別具有童年逆境與未有童年逆境青少年於家庭背景上的差異，本研究先比較不同面向童年逆境下的受訪者在經濟狀況、父母教育程度及性別上的差異。接著，再聚焦在青少年的行為問題上，比較遭遇不同面向之童年逆境程度的青少年，是否在行為問題上有顯著的不同；若童年逆境對問題行為產生影響，這之間的關係是否可以透過反學校文化中的「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加以解釋，因此在分析上將採取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童年逆境經驗作為自變項（目睹暴力、經驗暴力、無形家庭壓力），是否透過反學校文化的價值觀與行為，即「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進一步將童年時發生之不幸經驗傳遞到青少年的問題行為上。

第四節、變項之定義與測量

（一）依變項：問題行為

本研究在問題行為的測量上，區分為偏差行為與違法行為兩個部份。測量這二面向問題行為的資料是來自第四波的資料，以符合因果時間順序的議題。筆者先透過主成分因素分析法進行資料縮減，也指出問題行為的不同面，再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來建立本文的依變項。依變項為比率尺度的變項，分數越高表示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越嚴重，基於這些變項的測量尺度，本研究採用多元線性迴歸進行多變項分析。

1. 偏差行為

偏差行為所採取之題目包含詢問學生是否有以下行為：「抽煙、喝酒或吃檳榔」與「無照駕駛、騎車沒戴安全帽、逆向行駛、飆車」、「深夜在外遊蕩」與「喝醉酒」等題目。其中第一個題目包含4點尺度之李克特選項，頻率由「從來沒有」（1分）至「經常有」（4分），分數愈高則表示從事該問題行為的頻率愈高。後三題僅區分為有／無從事之。為了結合四道題目，筆者先對第一道題目重新編碼，簡化成有／無，即『從來沒有』（1分）轉為『無』（0分），『偶爾』、『有時』、『經常』歸類成『有』。接著，筆者針對偏差行為變項的四道題目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得到的KMO值為0.700（ p 值 <0.001 ），萃取出一個因子，共解釋48.09%的變異量。Cronbach's α 值為0.625。基於信效度分析結果，筆者加總4道題目成1個新變

項，命名為偏差行為，計分範圍從 0 至 4 分，分數愈高表示青少年的偏差行為程度越高。

2. 違法行為

違法行為所採取之題目包含：「偷竊或破壞他人物品」、「攜帶刀械、打架械鬥」、「有嗑藥經驗」與「加入過幫派」。其中第一題是以 4 點尺度之李克特選項進行測量，其餘題目皆區分為『有』與『無』兩類，為了對這四道題目進行資料縮減，筆者先將第一題重新編碼，將『從來沒有』（1 分）轉為『無』，『偶爾』、『有時』、『經常』歸類成『有』。接續針對四道題目進行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的 KMO 之值為 0.589 (p 值 < 0.001)，萃取出 1 個因素，共解釋 45.379% 的變異量，此變項命名為違法行為。信度分析顯示 Cronbach's α 值為 0.534。筆者加總四道題目成為新變項，命名為違法行為該新變項之計分範圍介於 0 至 4 分，分數愈高表示青少年的違法行為程度越嚴重。

(二) 自變項：童年逆境經驗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童年逆境經驗，這部份所需資料來自 w4 資料。在原始問卷題目上，詢問受訪者『在下面哪些階段，家裡曾經發生過以下事情？』這些事件包含「父母分居或離婚」、「去世」、「重病」、「精神疾病發作」、「有酗酒習慣」、「經濟變故」、「經常劇烈爭吵」、「家裡大人對其他家人使用暴力」與「自己在家常常動不動被打或虐待」等題目。原始選項是請受訪者依序勾選事件發生時期，由於本研究僅考慮有無經歷上述不幸事件，因此每一題的選項都將曾經經歷者（不管何時）都重新編碼為『有』，從未經歷者歸為『無』。在變項處理上，本研究基於釐清童年逆境不同面向的嚴重性（鄭瑞隆，2001），而將暴力經驗獨立出來，區分為「目睹暴力」與「經歷暴力」（分別為『有』、『無』兩類，以『無』為對照組），再對其餘童年不幸經驗進行因素分析，這些題目萃取出 1 個因子，共解釋 30.66% 的變異量（KMO 為 0.714， P 值 < 0.001 ），信度分析完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645，尚在可接受之範圍，本文將此命名為「無形家庭壓力」。「無形家庭壓力」的分數是加總 7 項事件的經歷數，計分範圍係 0 至 7 分，分數愈高表示青少年受家庭之壓力愈高。

(三) 中介變項：

本研究所要探究的中介機制為反學校文化的價值與行為，價值的部份為「對基本教育典範的認同度」，行為的部份則包含「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關於變項操作細節如下：

1. 基本教育典範認同度

基本教育典範認同度是透過 w3 學生問卷題目「你覺得現在就讀的學校是無趣的地方」與「你覺得現在就讀的學校是可以學到東西的地方」來進行測量，選項採取 4 點計分之李克特選項。本研究將「你覺得現在就讀的學校是可以學到東西的地方」一題反向編碼，使其分數越高越認同基本教育典範，接著計算兩道題目的平均分數，以維持 4 點計分範圍，分數越高則對基本教育典範認同度越高（Cronbach's α 值為 0.480，屬較低的程度範圍）。平均數為 2.94，標準差為 0.57。

2. 反學校行為

在反學校行為方面包含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兩部份，變項操作說明如下：

(1) 逃避學校

逃避學校之操作題目來自 w4 學生問卷，題目包含「上高三以來，你有沒有做過下列的事？」，涉及的事件包含「逃學」、「蹺課」與「在學校打架，或和老師起衝突」，由『從來沒有』（1分）至『經常有』（4分）等選項來掌握學生在學校的行為。經由信度分析得到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618。本研究取三道題目之平均得分，做為新變項「逃避學校」的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學生逃避學校的意願愈高。平均數為 1.19，標準差為 0.36。

(2) 奇裝異服

奇裝異服採取的題目係 w4 學生問卷題目「你曾經有過下列的打扮嗎？」包含「打多個耳洞、身體穿環、刺青」、「染髮、新潮髮型」、「嘻哈、台客台妹、酷炫造型」、「追求特定品牌」與「性感打扮」。選項分為『有』，設定為 1；與『無』，設定為 0。藉由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的 KMO 之值為 0.659 ($p < 0.001$)，萃取出 1 個因素，解釋 33.677% 的變異量，另信度分析得到 Cronbach's α 值為 0.497。筆者在此累積加五項題目，構成「奇裝異服」的總得分，範圍介於 0 至 5 分，分數愈高表示青少年在服儀打扮上越偏離學校希望的打扮。

(四) 控制變項：

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家庭經濟、父母教育程度、自我學習動機與自我教育期望共 5 項。

1. 性別

性別是根據問卷中的基本資料，區分為『男性』與『女性』。本文以『女性』為對照組 (0)，建立男生的虛擬變項 (1)。

2. 家庭經濟

經濟狀況是透過 w3 家長問卷題目「您家裡平均每個月的總收入是多少？」，選項包含『20,000 元以下 (含)』、『20,001~30,000 元』、『30,001~50,000 元』、『50,001~100,000 元』、『100,001~200,000 元』與『200,001 元以上 (含)』。本研究將這些類別轉換為以各組選項之組中點的自然對數，以建構為一連續變項。

3. 父母教育程度

父母教育程度的測量上使用的是 w3 家長問卷題目「您的教育程度」，選項包含『國中或以下』、『高中』、『高職』、『專科 (二、三、五專)、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一般大學』與『研究所 (碩博士)』。為表示學生家庭間父母教育程度的差異與觀察出本研究變項間之相關性，將選項重新編碼為「國中或以下」、「高中職」、「大專院校」與「碩博士」，再取父母教育程度較低之一方作為新變項，再建立虛擬變項進行分析上的操作，並以『國中或以下』做為對照組。

4. 自我學習動機

自我學習動機是藉由 w3 學生問卷的題目來操作化：「下列描述是否符合你的情況？」，情境包含「從小學開始，我從不會讓別的事耽誤功課」、「從小學開始，我回家都會複習上課教的東西」與「從小在學習上碰到困難，我會設法搞懂」等 3 道題目構成，選項採取 4 點計分之李克特選項。本研究先將這 3 道題目反向編碼，選項改作「非常不符合」(1 分) 至「非常符合」(4 分)，藉由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的 KMO 之值為 0.650 ($p < 0.001$)，萃取出 1 個因素，解釋 61.749% 的變異量，另信度分析得到 Cronbach's α 值為 0.690。後再取三道題目之平均得分，做為「自我學習動機」的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學生的自我學習動機越強。

5. 自我教育期望

學生之自我教育期望使用 w4 學生問卷題目「你期望自己唸到何種教育程度？」來進行測量，選項為『高中職畢業』、『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畢業』、『一般大學畢業』、『碩士學位』、『博士學位』與『沒想過/不知道』。本研究將該控制變項之答項簡化成『高中職畢業』、『大專院校畢業』、『碩博士畢業』與『沒想過/不知道』共 4 個選項，並建立虛擬變項，以『高中職畢業』為對照組。

表 1 分析變項的描述性統計 (N=13,680)

B. 連續變項描述統計				
	平均數	標準偏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自變項				
無形家庭壓力	0.98	1.28	7	0
中介變項				
教學基本典範認同度	2.94	0.57	4	1
逃避學校	1.19	0.36	4	1
奇裝異服	0.75	1.00	5	0
依變項				
偏差行為	0.67	1.00	4	0
違法行為	0.14	0.48	4	0
控制變項				
自我學習動機	2.49	0.54	4	1
家庭月收入	10.82	0.70	12.21	9.21

變項

A. 類別變項的百分比

自變項

家裡大人對其他家人使用暴力

有 32.8

無 67.2

自己在家常常動不動被打或虐待

有 16.6

無 83.4

控制變項

性別

男 48.2

女 51.8

自我教育期望

高中職畢業 2.0

大專院校畢業 30.8

碩博士畢業 52.1

沒想過/不知道 15.0

家庭教育程度

國中或以下 37.7

高中職 43.4

大專院校 18.2

碩博士 0.7

表 2 各變項間之皮爾森相關矩陣

	童年逆境		問題行為		反學校文化			家庭教育程度				家庭 月收 入	自我學 習動機	性別		自我教育期望				
	目睹家 庭暴力	經驗過 暴力	無形家 庭壓力	偏差 行為	違法 行為	教學典 範認同	逃避 學校	外型 打扮	國中或 以下	高中 職	大專 院校			碩博 士	男生	女生	高中職 畢業	大專院 校畢業	碩博士 畢業	
童年 逆境																				
問題	經驗過暴力	.328**																		
行為	無形家庭壓力	.296**	.204**																	
反學	偏差行為	.114**	.093**	.192**																
校文	違法行為	.116**	.148**	.144**	.297**															
化	教學典範認同	-.040**	-.045**	-.035**	-.087**	-.077**														
家	逃避學校	.094**	.114**	.123**	.357**	.386**	-.110**													
庭教	外型打扮	.062**	.054**	.118**	.368**	.141**	-.043**	.180**												
育程	國中或以下	.013	.005	.058**	.043**	.000	-.010	-.033**	.008											
度	高中職	.005	.011	.001	.003	.000	-.010	.020*	.014	-.681**										
家	大專院校	-.021*	-.020*	-.071**	-.054**	.003	.021*	.017*	-.024**	-.367**	-.413**									
庭	碩博士	-.007	-.005	-.015	-.015	-.009	.017*	-.008	-.018*	-.066**	-.074**	-.040**								
月	家庭月收入	-.059**	-.024**	-.217**	-.043**	-.012	.010	.029**	.012	-.320**	.050**	.316**	.097**							
收	自我學習動機	-.056**	-.043**	-.075**	-.108**	-.020*	.153**	-.082**	-.044**	-.007	.008	-.005	.013	-.013						
入	性別																			
動	男生	.011	.015	-.027**	.149**	.163**	-.068**	.157**	-.099**	-.026**	.018*	.008	.007	.043**	.025**					
機	女生	-.011	-.015	.027**	-.149**	-.163**	.068**	-.157**	.099**	.026**	-.018*	-.008	-.007	-.043**	-.025**	-1.000**				
性	自我教育期望																			
別	高中職畢業	.018*	.041**	.032**	.066**	.136**	-.050**	.097**	.027**	.060**	-.029**	-.035**	-.012	-.047**	-.007	.039**	-.039**			
自	大專院校畢業	.010	.011	.061**	.079**	.048**	-.077**	.053**	.069**	.126**	-.012	-.134**	-.047**	-.116**	-.036**	-.046**	.046**	-.096**		
我	碩博士畢業	-.012	-.028**	-.058**	-.102**	-.091**	.113**	-.115**	-.039**	-.168**	.032**	.160**	.044**	.155**	.069**	-.003	.003	-.150**	-.697**	
教	沒想過 / 不知道	-.003	.009	-.011	.016	.012	-.039**	.054**	-.046**	.048**	-.018*	-.037**	.004	-.048**	-.047**	.048**	-.048**	-.060**	-.280**	-.438**
育																				
期																				
望																				

*p < 0.05; **p < 0.01

肆、研究結果分析

第一節、研究結果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單變項分析

表 1 為本研究分析變項的描述性統計表，樣本數為 13,680 位學生。A 列是類別變項的次數分配，由該列可看出，目睹過家庭暴力的比例為 32.8%，經驗過家庭暴力的青少年則占樣本數之 16.6%，目睹過家庭暴力的比例大致為經驗過家庭暴力的兩倍。在自我教育期望上，期望自己取得碩、博士文憑者的比例占最大宗，為 52.1%，其次為大專院校畢業（30.8%），再者為沒想過／不知道自己能達到的教育程度為何的受訪者約 15.0%，期望自己高中職畢業的僅占 2.0%，顯現出本研究分析的樣本中超過一半期許自己擁有高學歷的身分。然而，這些青少年的家長的教育程度大多為高中職畢業，約占 43.4%，其次為國中或以下學歷畢業（37.7%），再者才為大專院校畢業（18.2%），最少的是碩博士畢業（0.7%）。B 列為連續變項的描述統計資料，由該列可看出，無形家庭壓力的平均數是 0.98，標準差為 1.28，表示大多數受訪者的無形家庭壓力呈現較低的分數。於反學校文化上，教學基本典範認同度在大多數受訪者身上呈現較高的分數（平均數=2.94），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的平均數偏低（1.19 與 0.75），指出大多數受訪者對該二項的分數較低，即曾未從事或很少從事過。問題行為中，受訪者於偏差行為的平均數（0.67）較違法行為（0.14）高出至少約 5 倍，顯示研究所使用的樣本數內，其從事偏差行為的比例是較違法行為高的。自我學習動機的平均數為 2.49，標準差為 0.54，而家庭月收入的平均數為 10.82，標準差為 0.70，該二項的描述統計指出，本研究所使用樣本自我學習動機與家庭月收入大多落在中間數值，未有過高或過低的樣態顯現於分析中。

(二) 描述性統計分析：雙變項分析

1. 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

表 2 呈現雙變項間的皮爾森相關矩陣。該表格指出，童年逆境的三個測量構面具有顯著的關聯，皆為正相關，其中「經驗過暴力」與「目睹家庭暴力」間的相關係數最高，為 0.328 ($p < 0.01$)，表示經驗過暴力的青少年可預測目睹家庭暴力分數的變化。此外，就童年逆境與家庭教育程度的關係而言，青少年之家庭教育程度為「國中或以下」與「無形家庭壓力」呈現正相關，「大專院校」與童年逆境三個變項皆達顯著負相關。這項結果顯示，家庭教育程度為國中或以下之青少年，可預測無形家庭壓力分數的變化，且家庭教育程度為大專院校之青少年則可預測所有童年逆境變項的分數變化。性別層面上，男生在目睹家庭暴力與經驗過暴力上雖為正相關，女生則呈現負相關，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僅在經歷無形家庭壓力上，與女性為顯著正相關、與男性為顯著負相關。不過，於雙變數表格內，童年逆境與家庭月收入皆呈現顯著負相關 ($p < 0.01$)，表示家庭月收入愈高，童年逆境的程度愈低。

接著，本文將焦點聚焦於問題行為與童年逆境之關聯，表 2 指出，童年逆境三變項皆與偏差行為呈現顯著正相關，其中，「無形家庭壓力」的效果是最強的 ($r =$

0.192, $p < 0.01$)，再者是「目睹家庭暴力」($r = 0.114, p < 0.01$)，最後是「經驗過暴力」($r = 0.093, p < 0.01$)。於違法行為與童年逆境的關聯上，童年逆境變項皆與違法行為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與「經驗過暴力」的相關係數最高 ($r = 0.148$)，其次之效果為「無形家庭壓力」($r = 0.144$)，最後為「目睹家庭暴力」($r = 0.116$)。

2. 童年逆境的性別與家庭背景差異

表 3 呈現青少年童年逆境之性別與家庭背景的差異。該表格顯示，家庭教育程度與目睹家庭暴力及經驗過暴力上，無論青少年其家庭教育程度為何，其與目睹家庭暴力的次數百分比皆大約維持在 29%~34% 左右，與經驗過暴力的次數百分數皆大約維持在 14%~18%，百分比範圍並未差距過大 (4%~5%)，而兩者的卡方值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表示家庭教育程度較無法預測青少年目睹過暴力及經驗過暴力的變化。在家庭月收入上，其與目睹過暴力的次數百分比大約在 29%~41%，與經驗過暴力的次數百分比大約在 15%~20%，和前者相較，後者的百分比範圍較小 (12%與 5%)，然而兩者的卡方值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家庭月收入是可預測目睹過暴力和經驗過暴力的分數變化。性別層面，無論男女在目睹過暴力或是經驗過暴力上，兩者的次數百分比皆幾乎相同，且其卡方值亦未達到顯著水準，代表性別可能無法預測目睹過暴力及經驗過暴力的分數變化。

無形家庭壓力對於家庭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與性別上，其 F 值或 T 值皆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 ($p < 0.001$)，表示家庭教育程度、性別與家庭月收入可預測無形家庭壓力的分數變化。上述分析之結果大致與表 2 雙變項間的皮爾森相關矩陣相同。

表 3 童年逆境之性別與家庭背景差異

		目睹暴力		經驗暴力		無形家庭壓力	
		次數 (%)	χ^2 值	次數 (%)	χ^2 值	平均 (標準差)	F 檢定 / t 檢定
家庭教育	國中或以下	1732(33.6)	7.193	869(16.8)	5.883	1.08(1.37)	35.605***
	高中職	1961(33.0)		1014(18.0)		0.98(1.28)	
	大專	763(30.7)		374(15.0)		0.79(1.15)	
	研究所	28(28.9)		14(14.4)		0.75(1.09)	
家庭收入	2 萬及以下	408(41.6)	58.777***	191(19.5)	12.701*	1.73(1.57)	171.287***
	20,001~30,000	666(36.3)		332(18.1)		1.34(1.42)	
	30,001~50,000	1418(32.1)		729(16.5)		0.99(1.27)	
	50,001~100,000	1495(31.3)		742(15.6)		0.81(1.16)	
	100,001~200,000	407(29.2)		229(16.4)		0.59(0.98)	
	200,001 及以上	90(31.9)		48(17.0)		0.75(1.14)	
性別	男性	2198(33.3)	1.597	1135(17.2)	3.273	0.95(1.29)	3.204***
	女性	2286(32.3)		1136(16.0)		1.02(1.2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 多變項迴歸分析

由文獻回顧可得知，家庭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對青少年各方面狀況有著深遠的影響（吳瓊洳，2000；張如欣，2011；Willis, 1977；Liu & Xie, 2016；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因此本文各迴歸模型皆控制家庭月收入、家長教育、性別、自我學習動機、教育期望與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因素，再將童年逆境、反學校文化與問題行為之關聯配合已放入之控制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如表 4、表 5 與表 6 所示。表 4 針對青少年問題行為中的偏差行為展現 2 種模型，表 5 為針對青少年問題行為中的違法行為所得出的 2 種模型，表 6 則是不同性別青少年在加入童年逆境、反學校文化配合控制變項的操作下得出之偏差行為及違法行為的 4 種模型展現。

1. 青少年偏差行為

表 4 的模型 1 是於控制家庭月收入、性別、自我學習動機、家庭教育程度與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因素後，童年逆境影響偏差行為的效果；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礎上加入反學校文化的三個變項，二個模型的 F 值分別為 106.04 ($p < 0.001$) 與 332.034 ($p < 0.001$)。模型 2 比模型 1 多使用 3 個自由度，模型的解釋力大幅提昇了 0.182，除了顯示模型 2 是一個較佳的模型之外，也顯示反學校文化對於解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有著良好的預測效果。

模型 1 的分析結果指出，童年逆境三個變項與偏差行為間之雙尾顯著性 p 值皆係小於 0.001，表示童年逆境與偏差行為具有高度正相關性，即目睹家庭暴力、經驗過暴力或是經歷越多無形家庭壓力，青少年越可能從事偏差行為，這項結果支持部分假設一的觀點。其中，無形家庭壓力對偏差行為的迴歸係數為 0.127，表示在其他變項維持固定的條件下，無形家庭壓力每提高 1 分，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分數就上升 0.127 分。目睹暴力對偏差行為的迴歸係數為 0.098，目睹暴力相對於未目睹暴力者，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平均分數多了 0.098 分。經驗家庭暴力對偏差行為的迴歸係數為 0.094，這意味著：經驗家庭暴力者相對於未經歷家庭暴力者，其偏差行為的平均分數高出 0.094 分。

至於控制變項的部份，先就性別來說，相對於女性，男性從事偏差行為的平均分數顯著地比女性高出 0.311 分，表示男性青少年更傾向從事偏差行為。家長教育程度上，相對於家長為國中或以下學歷的青少年，家長的學歷達大專的青少年比較不容易產生偏差行為。惟模型 1 指出，家庭月收入於偏差行為上未顯示顯著效果，表示家庭月收入多寡不影響著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程度。在自我抱負中，自我學習動機越高，從事偏差行為的程度越低 ($b = -0.169, p < 0.001$)，即當控制其他變項，青少年自我學習動機每提升 1 分，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平均分數會下降 0.169 分。在自我教育期望上，以「高中職」作為對照組，期待自己能完成「碩博士」的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平均分數比「高中職」減少 0.429 分；再者為「不知道／沒想過」，他們的偏差行為平均分數比「高中職」少 0.342 分；「大專院校」比「高中職」平均減少 0.251。整體而言，模型 1 的調整後 R 平方為 0.084，表示模型 1 所使用的所有變項僅能解釋 8.4% 的偏差行為程度。

模型 2 於模型 1 的基礎上，加入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之反學校文化變項進行分析。分析結果顯示，童年逆境的變項效果經由加入反學校文化三變項後而減弱，表示反學校文化部分中介童年逆境對偏差行為的效果，目睹家庭暴力由 0.098 下降至 0.062，經驗暴力由 0.094 下降至 0.025，無形家庭壓力由 0.127 下降至 0.080，其中經驗暴力變項甚至在模型 2 中轉為不顯著，可得知童年逆境中，目睹家庭暴力與無形家庭壓力是透過反學校文化因素中介後仍具有影響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直接效果，經驗暴力則完全由反學校文化變化所中介。

反學校文化在模型 2 內具有中介童年逆境的效果，「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三變項皆能顯著地增加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這正好支持部分假設二、三的推論。其中，教學典範認同度的迴歸係數為-0.027，即在控制其他變項之下，教學典範認同度的分數每上升 1 分，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分數就隨之下降 0.027 分；逃避學校的迴歸係數為 0.689，即在控制其他變項之下，逃避學校的分數每上升 1 分，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分數就隨之上升 0.689 分；奇裝異服的迴歸係數為 0.316，即控制其他變項之下，青少年在奇裝異服的分數每上升 1 分，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分數就上升 0.316 分。

接著我們來觀察模型 2 與模型 1 中控制變項的係數變化，除了家長教育之外，大部份的控制變項對於偏差行為的影響模式大致不變，但效果稍微減弱。家庭教育程度的部份，家長為「高中職畢業」反而由模型 1 的未顯著達到模型 2 的顯著樣態；換言之，加入反學校文化因素後，家庭教育程度為「高中職畢業」已能預測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頻率。性別上，以女性為對照組，男性的迴歸係數降為 0.294，仍為顯著正相關，表示男性青少年更傾向從事偏差行為。在自我抱負的部份，自我學習動機的係數由模型 1 的-0.169 下滑至-0.118，反學校文化確實中介自我學習動機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預測效果，因此其影響程度較模型 1 更微弱；在自我教育期望上，模型 1 之三選項皆具顯著性，然當加入反學校文化因素後，三選項的影響程度有著大幅度的下滑，「大專院校」由-0.251 下滑至-0.082，「碩博士」由-0.429 下滑至-0.166，「不知道／沒想過」則由-0.342 下滑至-0.120，大致下降 3 倍，其中大專院校未達顯著差異，表示自我教育期望為「碩博士畢業」與「不知道／沒想過」係於模型 1 與模型 2 中皆能明確預測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次數頻率。整體而言，模型 2 的調整後 R 平方為 0.266，與模型 1 的 0.084 有著相當大之程度差異，模型 2 內所有變項可解釋 26.6% 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內容，反學校文化大幅提升青少年從事偏差行為的解釋力，更加證實假設二、三部分的觀點。

表 4 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N=13,680)

	模型1	模型2
男性 (ref.:女性)	0.311*** (0.017)	0.294*** (0.015)
家庭收入	0.023 (0.013)	-0.022 (0.012)
家長教育 (ref.:國中)		
高中職	-0.030 (0.019)	-0.051** (0.017)
大專院校	-0.105*** (0.026)	-0.112*** (0.023)
碩博士	-0.138 (0.062)	-0.064 (0.089)
自我抱負		
學習動機	-0.169*** (0.015)	-0.118*** (0.014)
教育期望 (ref.:高中職)		
大專院校	-0.251*** (0.060)	-0.082 (0.054)
碩博士	-0.429*** (0.059)	-0.166** (0.053)
不知道/沒想過	-0.342*** (0.062)	-0.120* (0.055)
童年逆境		
目睹暴力	0.098*** (0.019)	0.062*** (0.017)
經驗暴力	0.094*** (0.024)	0.025 (0.021)
無形家庭壓力	0.127*** (0.007)	0.080*** (0.006)
反學校文化		
教學典範認同度		-0.027* (0.013)
逃避學校		0.689*** (0.021)
奇裝異服		0.316*** (0.008)
常數項	0.903*** (0.157)	0.155 (0.147)
<i>F</i>	106.04***	332.034***
<i>R</i> ²	0.085	0.267
adj. <i>R</i> ²	0.084	0.266

註：表格中數值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括弧內為標準誤。**p* < 0.05; ***p* < 0.01; ****p* < 0.001

2. 青少年違法行為

表 5 的模型 1 呈現控制家庭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性別、自我學習動機與自我教育期望後，童年逆境影響違法行為的效果，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礎上加入反學校文化的因素，二個模型的 F 值分別為 104.99 ($p < 0.001$) 與 182.66 ($p < 0.001$)。模型 2 比模型 1 多使用 3 個自由度，但模型的解釋力大幅提昇 0.11，表示模型 2 比模型 1 更能預測青少年的違法行為。

模型 1 的結果指出，童年逆境與青少年違法行為間具有顯著關聯，表示童年逆境可以預測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程度，這項結果部分支持假設一的觀點；其中，經驗暴力的迴歸係數為 0.132，表示控制其他變項下，經驗過暴力者相對於未經歷者，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平均分數多出 0.132。目睹暴力的迴歸係數為 0.047，當控制其他變項下，目睹暴力相對於未目睹暴力者，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平均分數多出 0.047。無形家庭壓力的迴歸係數為 0.042，表示當控制其他變項下，無形家庭壓力分數每上升 1 分，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分數就上升 0.042。

在家庭月收入上，迴歸係數為 0.013 ($p < 0.05$)，表示家庭月收入愈高，青少年從事愈多違法行為，然而這項結果與既有文獻不符（陳建州，2001；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須藉由模型 2 加入反學校文化因素後進一步證實。家庭教育程度上，僅「大專院校」畢業者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高中職」畢業與「碩博士」畢業者皆未達到統計顯著水平，「大專院校」畢業與違法行為間係呈現正相關（0.034），表示家長教育程度為大專者相較於「國中及以下者」，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程度較高，這項結果也與既有文獻結果相悖（陳建州，2001；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須藉由模型 2 加入反學校文化因素後進一步證實。自我學習動機之迴歸係數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於自我教育期望上，分析結果指出，相對於高中職，「碩博士畢業」、「大專院校畢業」、「不知道／沒想過」之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程度皆較低。性別層面，以女性作為對照組後，青少年男性較女性更傾向從事違法行為（ $b = 0.154, p < 0.001$ ）。整體而言，模型 1 的調整後 R 平方為 0.084，僅能解釋 8.4% 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程度。但模型中之家庭收入、家長教育之結果都與過去研究相悖，因此仍須進一步透過模型 2 詳細觀察。

模型 2 於模型 1 多加入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與奇裝異服等反學校文化變項。在童年逆境部分，當模型 2 加入反學校文化變項後，童年逆境的三個變項仍顯著影響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程度，但迴歸係數皆較模型 1 微弱，這些結果表示反學校文化部份中介童年逆境對違法行為的作用，但童年逆境仍保有對違法行為的直接作用。經驗暴力的迴歸係數為 0.099 ($p < 0.001$)、目睹家庭暴力的迴歸係數為 0.033 ($p < 0.001$)、無形家庭壓力的迴歸係數為 0.026 ($p < 0.001$)，整體影響模式與模型 1 類似，但效果相對下降。在反學校文化變項部份，三個變項都對違法行為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可知反學校文化能預測青少年違法行為的程度。其中，逃避學校的迴歸係數為 0.426 ($p < 0.001$)，當其他變項不變，青少年逃避學校的分數每上升 1 分，其從事違法行為的分數就上升 0.426 分。奇裝異服的迴歸係數為 0.036，當其他變項維持不變，青少年之奇裝異服的分數每上升 1 分，其從事違法行為程度就上升 0.036 分。教學典範認同度的迴歸係數為 -0.016，即當其他變項固定的情況下，青少年對教

學典範認同的分數每上升 1 分，其從事違法行為分數就隨之下降 0.016 分。這表示，青少年表現越高程度的反學校文化，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程度愈嚴重，這部分支持假設二、三的觀點。

模型 2 中加入反學校文化變項後，家庭月收入的效果轉為不具統計顯著差異，表示家庭月收入其實於青少年違法行為上係不具有預測能力，影響力幾乎為 0。家庭教育程度上，父母為「高中職」、「大專院校」與「碩博士」畢業者，相較於對照組，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自我抱負中，自我學習動機的迴歸係數為 0.020，在控制反學校文化之後，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表示當控制其他變項之後，自我學習動機每提升 1 點，青少年違法行為程度就上升 0.020 分，然而此結果與既有文獻相去甚遠 (Brumley et al., 2017; Trinidad, 2021)，有待進一步釐清；自我教育期望上，三個虛擬變項仍然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雖然加入反學校文化變項後，係數減弱，但仍可預測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程度。性別層面上，以女性為對照組後，男性與從事違法行為之間仍達到一定之顯著水準，即男性較女性容易從事違法行為。

整體而言，於模型 1 的基礎加入反學校文化因素後構築成模型 2，其調整後 R 平方為 0.194，與模型 1 之結果相距約 2 倍，有相當大的差異，解釋 19.4% 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的內容。這項結果指出，反學校文化的加入大幅度提升模型的解釋力，正好更證實假設二、三的觀點。

表 5 青少年違法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N=13,680)

	模型1	模型2
男性 (ref.:女性)	0.154*** (0.008)	0.112*** (0.008)
家庭收入	0.013* (0.006)	-0.002 (0.006)
家長教育 (ref.:國中)		
高中職	0.011 (0.009)	-0.001 (0.008)
大專院校	0.034** (0.012)	0.019 (0.012)
碩博士	-0.015 (0.048)	-0.005 (0.045)
自我抱負		
學習動機	-0.002 (0.007)	0.020** (0.007)
教育期望 (ref.:高中職)		
大專院校	-0.376*** (0.029)	-0.289*** (0.027)
碩博士	-0.455*** (0.028)	-0.329*** (0.027)
不知道/沒想過	-0.406*** (0.030)	-0.315*** (0.028)
童年逆境		
目睹暴力	0.047*** (0.009)	0.033*** (0.009)
經驗暴力	0.132*** (0.011)	0.099*** (0.011)
無形家庭壓力	0.042*** (0.003)	0.026*** (0.003)
反學校文化		
教學典範認同度		-0.016* (0.007)
逃避學校		0.426*** (0.011)
奇裝異服		0.036*** (0.004)
常數項	0.264*** (0.075)	-0.173* (0.074)
<i>F</i>	104.99***	221.130***
<i>R</i> ²	0.084	0.195
adj. <i>R</i> ²	0.084	0.194

註：表格中數值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括弧內為標準誤。**p* < 0.05; ***p* < 0.01; ****p* < 0.001

3. 不同性別導致之問題行為差異

表 6 的模型 1 至模型 4 是依性別分組的青少年問題行為，其經由多元迴歸分析後的結果，男性樣本數為 6600 位，女性樣本為 7080 位，模型 1 為男性青少年之偏差行為的多元迴歸模型 ($F=154.996, p<0.001$)，模型 2 則為女性青少年之模型 ($F=182.620, p<0.001$)；模型 3 為男性青少年之違法行為的多元迴歸模型 ($F=130.699, p<0.001$)，模型 4 則為女性青少年之模型 ($F=63.917, p<0.001$)。

我們可以綜合分析模型 1 與模型 2，藉此瞭解童年逆境與反學校文化變項對於偏差行為影響的性別差異。男性青少年經驗暴力的不幸經驗並未顯著影響其偏差行為，但女性青少年的經歷暴力的不幸則增加其偏差行為。另外兩項童年逆境經驗（目睹暴力、經歷無形家庭壓力）對於偏差行為的影響皆達顯著。接著，藉由模型 3 與模型 4，本文發現女性青少年目睹暴力與違法行為無顯著關聯，但男性青少年目睹暴力經驗則會顯著增加其違法行為，而另外的兩個童年逆境變項—經驗暴力、經歷無形家庭壓力—對違法行為的影響無明顯的性別差異。

就反學校文化之影響的性別差異主要展現在對教學典範的認同度，男性青少年對教學典範認同度降低了他們的偏差行為，但女性青少年對教學典範認同度並未顯著降低/增加其偏差行為，而逃避學校、奇裝異服對青少年之偏差行為的影響都是顯著的正向影響，不過就迴歸係數來說，除了女性在逃避學校於偏差行為的迴歸係數較男性高之外，男性在奇裝異服的迴歸係數略高於女性，表示反學校文化中的奇裝異服對男性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大於女性，而逃避學校對女性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大於男性。置於在違法行為的部份，對教學典範認同度、逃避學校、奇裝異服都顯著影響男性，但教學典範認同度在女性青少年未有顯著，僅有逃避學校、奇裝異服顯著影響女性青少年的違法行為。這三個反學校文化的迴歸係數都是男性大於女性，且逃避學校的男性幾乎是女性的 1.5 倍，而奇裝異服的男性幾乎更達到女性的 6 倍。本文提到的反學校文化做為解釋青少年之違法行為上（表 5），是一個更適合解釋男性青少年違法行為的模型。

至於在控制變項影響的性別差異上，本文發現「家庭教育程度」、「自我學習動機」對偏差行為的效果，除了家庭教育程度為碩博士的女性青少年其迴歸係數較男性高之外，女性的迴歸係數皆較男性低；「家庭月收入」與「自我教育期望」對偏差行為的影響，女性的迴歸係數都男性高。某種程度來說，女性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受到家庭經濟與教育前景（或抱負）的影響較大；但男性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受到教育環境（包含父母教育的文化信念或自我成就動機）的影響較大。但在違法行為的部份，男性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對違法行為的影響效果明顯高於女性，表示男性「自我教育期望」較女性強，男性之教育期望的迴歸係數大都約為女性效果的 5 倍。

表 6 男性與女性青少年問題行為之多元迴歸分析

	偏差行為		違法行為	
	模型1 (男)	模型2 (女)	模型3 (男)	模型4 (女)
家庭收入	0.012 (0.019)	-0.055*** (0.014)	-0.003 (0.011)	-0.004 (0.006)
家長教育 (ref.:國中)				
高中職	-0.068* (0.027)	-0.038 (0.020)	-0.001 (0.015)	-0.006 (0.008)
大專院校	-0.150*** (0.037)	-0.077** (0.028)	0.024 (0.020)	0.012 (0.011)
碩博士	-0.029 (0.137)	-0.101 (0.113)	-0.043 (0.076)	0.024 (0.046)
自我抱負				
學習動機	-0.147*** (0.021)	-0.084*** (0.018)	0.029* (0.011)	-0.000 (0.007)
教育期望 (ref.:高中職)				
大專院校	-0.016 (0.077)	-0.158* (0.075)	-0.392*** (0.042)	-0.080** (0.030)
碩博士	-0.147 (0.076)	-0.207** (0.075)	-0.462*** (0.042)	-0.094** (0.030)
不知道/沒想過	-0.107 (0.079)	-0.143 (0.078)	-0.430*** (0.044)	-0.091** (0.031)
童年逆境				
目睹暴力	0.067* (0.028)	0.063** (0.021)	0.054*** (0.015)	0.015 (0.008)
經驗暴力	-0.007 (0.034)	0.054* (0.026)	0.130*** (0.019)	0.067*** (0.010)
家庭壓力	0.095*** (0.010)	0.064*** (0.008)	0.039*** (0.006)	0.012*** (0.003)
反學校文化				
教學典範認同度	-0.046* (0.020)	-0.009 (0.017)	-0.027* (0.011)	-0.013 (0.007)
逃避學校	0.665*** (0.029)	0.717*** (0.033)	0.463*** (0.016)	0.312*** (0.013)
奇裝異服	0.381*** (0.013)	0.277*** (0.009)	0.083*** (0.007)	0.014*** (0.003)
常數項	0.162 (0.231)	0.423* (0.184)	-0.021 (0.128)	-0.154* (0.074)
N	6600	7080	6600	7080
F	154.996***	182.620***	130.699***	63.917***
R ²	0.248	0.266	0.217	0.112
adj. R ²	0.246	0.264	0.216	0.111

註：表格中數值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括弧內為標準誤。*p < 0.05; **p < 0.01; ***p < 0.001

伍、結論與檢討

第一節、結論

近年來童年逆境的議題逐漸發燒，由心理健康壓力、問題行為、性別差異等觀點進行討論的文獻以累積不少（陳杏容、陳易甫，2019；俞國良、李森 2021；陳杏容，2021；Brumley et al., 2017; Ida Haahr-Pedersen et al., 2021; Trinidad, 2021），老年生活的品質也很有可能與童年遭受的逆境經驗有所關連性（李月、陸杰華，2020；劉霖等，2021）。這些結果的根源往往係來自青少年於家庭當中遭遇不幸事件，無法藉自身消化或是透過社會給予的支持力道不足而轉變成複雜的社會議題。既有研究試圖以情緒角度解釋童年逆境的影響力，然而甚少由文化層面的意涵解釋童年逆境在其中所賦予的連結機制、解釋方向。童年經歷的不幸事件的內涵與痛苦程度所導致的影響力道更較少被觸及討論。本研究即是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第三波與第四波資料的基礎上，嘗試釐清童年逆境萌發的家庭脈絡，以及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間究竟產生何種連結，透過反學校文化變項來探討這之間連結的文化因素，探究這些因素如何傳遞童年不幸事件的負向效果。本研究不僅補充現有文獻的觀點，增廣文獻上的多元性，更對反學校文化、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間的關聯提供下列思路，以試圖延伸反學校文化、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研究的可能性。

首先，童年逆境的程度是有面向與輕重之分。本研究將童年逆境區分無形壓力與有形壓力，即精神上壓力與身體上迫害，理解不同面向之童年逆境嚴重程度如何影響青少年從事問題行為的程度。分析的結果顯示，青少年經歷愈多的童年逆境，不論是偏差行為或違法行為，其嚴重程度就愈高，這符合假設一的觀點，且與既有文獻相呼應（陳旺德等，2020；Brumley et al., 2017; Trinidad, 2021）。詳細而言，童年逆境於偏差行為中，青少年遭遇身體上家庭暴力虐待的經驗無法明確地指向其從事偏差行為的結果，這種現象於男性上較為明顯，在女性中則各數值相當接近，難以指出效果最強的童年負面事件經驗，且效果皆較男性薄弱。然而，童年逆境於違法行為中，顯示遭遇暴力虐待的程度愈高，青少年從事違法行為愈嚴重，且較偏差行為為高。目睹家庭暴力或是背負無形家庭壓力愈高的青少年雖使得從事違法行為程度上升，卻並非違法行為提升的主因，這種現象於男性上較具有代表性，女性的效果則薄弱許多，合乎洪聖欽（2011）文獻與研究的結果。

反學校文化因素於 Willis（1977）的書中最主要係探討青少年對基本教育交換邏輯體系即教學基本典範的認同多寡，而於黃庭康（2017）的延伸討論下，家庭價值觀確實影響青少年的價值深遠，當家庭賦予學校負面意義並傳遞給青少年身，青少年也可能因不信任學校的價值體系，逐漸模仿家長反抗權威甚至極有可能逃離權威（吳瓊洳，2000；陳建州，2001；張如欣，2011；Liu & Xie, 2016）。這樣的現象可能更容易出現在弱勢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身上，他們更傾向模仿家庭行為或壓抑自身情緒，而將這種模式帶進學校，更融入學校內部所謂的反學校文化特徵，這種 Schafer（2011）所指出的「結構化的履歷」於本研究的模型中徹底呈現出來。本研究指出，反學校文化本身即可增加青少年從事問題行為程度，且部分中介了童年逆境直接對青少年問題行為的負面效果，這成為支持假設二、三與四的關鍵。前述結

果顯示，男性不論於偏差行為或違法行為，其反學校文化的係數效果皆較女性要為明顯，女性對於基本教學典範認同與奇裝異服等非對抗式行為在違法行為上顯著有效，惟效果微弱，這可能是因為女性出自於家庭本身的教育策略而不輕易涉及違法問題（陳怡如，2013），然而女性在非對抗式行為在偏差行為上僅有奇裝異服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現女性較常採取不輕易被發現的反學校文化來舒緩在學校所遇到的挫折、滿足自身的要求及社會期待（楊巧玲，2007；林秀怡，2016；吳中勤，2016）。女性的教學典範認同未達到顯著的緣由，可能係出自女性受傳統好女孩框架的刻板印象，女性較被要求遵守陰柔特質的標準，即使不認同教學典範，女性為維持社會期待的要求，較男性更傾向實踐家長或教師對學習上的要求（黃超、吳愈曉，2016），巧妙地對應 Willis（1977）的研究。

最後，青少年自我學習的動機及對自我教育程度的期待可促使其脫離原生家庭或學校環境所給予的不如意（陳旺德等，2020；陳杏容，2021；Brumley et al., 2017；Trinidad, 2021）。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在偏差行為與違法行為的整體觀察上與社會脈絡相合，即期望愈高則減緩偏差行為或違法行為，其中可大幅有效降低違法行為。但是，不知道或沒想過自我教育期望的青少年藉由高中職作為對照組後，其下降的平均分數較期望能夠大專畢業的青少年更多。就性別層面詳細而言，在偏差行為上，不知道或沒想過自我教育期望的女性青少年其迴歸係數卻較大專畢業的低，男性則與整體狀況相似；在違法行為上，無論男女性，則與整體狀況相似，即不知道或沒想過自我期望的青少年下降的分數都較期望大專畢業的青少年多。青少年整體自我學習動機而言，青少年自我學習動機愈強，有助於減低從事問題行為的次數，然而在違法行為上卻呈現迥異的結果：自我學習動機與違法行為間之係數為正數，且在男性上尤為如此，女性則是無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換言之，自我學習動機愈高，違法行為的程度愈高，此結果顯示於男性，卻對女性無顯著作用，此結果與常理脈絡相違背，可能需要後人進一步釐清。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首先，童年逆境的因素不只有無形壓力、目睹過暴力與經驗過暴力，尚有性虐待等因素等，然而本研究建立於次級問卷資料的使用上，僅能針對問卷題目加以分析，問卷所未提及的內容為筆者無法作測量的部分，仍須待未來研究深入探討。再者，於其他研究者所撰之研究有提及具有童年逆境後的青少年仍能不被其逆境所影響，以正面的態度迎接生活（陳旺德等，2020），惟本研究僅為量化研究，個人化的心理健康因素與韌性無法依賴數據統計完全表示，僅得依整體數據取向分析結果，有待未來研究透過質性研究進行更多深入的探究。第三，反學校文化作為學校的次文化，不一定只有一種。同儕團體於學校內形成各種團體，對於具反學校文化的特色團體，本研究僅依賴次級資料進行分析，無法針對問題細節深入探討，有待他人透過訪談或量化問卷建構之。最後，筆者於文獻上的分析尚未成熟，可能會有漏掉其他因素觀察的可能性，在操作上可能也會有無法真實反映出文獻的可能性，必須仰賴未來研究的重複檢驗，確保在各因素中連結正確的理論文獻。

綜上而言，本研究將童年逆境與問題行為的直接效果再次提出，藉由反學校文

化的中介下，青少年對於基本教學典範的認同度、逃避學校行為與奇裝異服會在性別認同上有所差異，其家庭背景雖與童年逆境產生連結，然家庭月收入於違法行為上並沒有與之關聯，而係顯著在青少年的偏差行為上。家庭教育程度雖能協助青少年降低從事偏差行為的頻率，但在違法行為上卻毫無功效，依賴的僅僅係青少年對於自我的教育期望。換言之，青少年擁有安全的家庭環境與學校環境，及自我學習動機與自我教育期望高，問題行為的從事頻率自然下降，惟實際上需要倚賴社會上力量支持青少年擺脫負面情境，本研究僅指出童年逆境、反學校文化與問題行為間之連結和思路，問題細節的探討仍需要反覆釐清青少年不想讀書的原因，進一步調適其對於自身環境上的敵意，並逐漸制訂對青少年而言完善的對策。

陸、參考書目

- 王郁琮(2014)。台灣青少年異質性憂鬱發展軌跡之性別差異及與違常行為之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7(1)，97-130。
- 史家瑄(2008)。國中生的自我調節、壓力因應策略與學校生活適應之關係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臺北市。
- 白般若(2010)。破繭而出—我在育幼院的生命之旅（未出版之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臺北市。
- 李佳桂、馮瑞鶯(2020)。自我認知對曾有兒童期負面經驗之成年早期者物質使用行為之影響機制（NHRI-EX108-10820PC）。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
- 吳中勤(2016)。中學生偏差行為組型的異質性分析：社會心理學觀點的詮釋。**教育心理學報**，47(4)，525-546。
- 吳瓊洳(2000)。國中學生反學校文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市。
- 李月、陸杰華(2020)。童年逆境對老年人抑鬱的影響研究。**人口學刊**，242，56-69。
- 沈瓊桃(2010)。暴力的童年、堅韌的青年：目睹婚暴暨受虐青年復原力之探討。**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115-160。
- 林秀怡(2016)。偏差與犯罪行為之性別差異——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47(1)，73-104。
- 林恩霓(2021)。童年負面經驗共生的異質性與台灣青少年的憂鬱症狀：潛在類別分析。輔仁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新北市。
- 紀金山(2012)。教師工作結果與其工作情境因素之影響：以 TEPS 第三和第四波高中職教師調查為例。**台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2(2)，35-83。
- 洪聖欽(2011)。國中學生逆境經驗與心理健康關係之探究。屏東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屏東縣。
- 張如欣(2011)。國中生偏差行為因素之研究。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新北市。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pu77t6>
- 常欣怡、宋麗玉(2010)。機構安置少年之生活壓力對憂鬱情緒之影響：以自尊為調節變項。**社會發展研究學刊**，8，51-74。
- 俞國良、李森(2021)。危機與轉機：童年期虐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及應對策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5-15。
- 秘舒、凌旻華(譯)(2018)。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原編著：Willis, P.）。麥田。（原著出版於 1977 年）
- 陳杏容(2021)。探索成年初顯期特徵、家庭經濟與心理健康之關聯。**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4(3)，193-227。

- 陳杏容、陳易甫(2019)。早期家庭經濟劣勢與成年初顯期發展成果之潛在剖析分析與其影響因子。**中華心理衛生學刊**，32(1)，89-118。
- 陳怡如(2013)。性別與偏差行為的階級結構：「權力—控制理論」的再檢視。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新北市。
- 陳旺德、陳伯偉、林昱瑄(2020)。培力還是侷限？：兒少安置機構、慣習形塑與階級效應。**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2，1-55。
- 陳建州(2001)。重探學校教育功能--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力變化之研究。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嘉義縣。
- 陳毓文(2008)。國內接受機構安置少年憂鬱情緒之探究：問題陳顯與解釋因素。**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1(1)，75-101。
- 彭淑華(2006)。保護為名，權控為實？—少年安置機構工作人員的觀點分析。**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5，1-36。
- 黃庭康(2017)。P. Willis 的《學做工》：概念、方法與研究方向。**教育研究集刊**，63(4)，37-63。
- 黃超，吳愈曉(2016)。中學生教育期望的性別差異：表現與成因。**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4月，121-132。
- 楊巧玲(2007)。從性別關係取徑看同儕互動——以一所高中學生的校園經驗為例。**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5(2)，79-112。
- 鄭瑞隆(2001)。家庭暴力被害經驗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係之研究。**犯罪學期刊**，8，215-246。
- 劉霖、宋潔、姜倩倩、鹿笑寒、陳海雯、徐祥敏(2021)。童年逆境與中老年人健康關係的研究進展。**解放軍護理雜誌**，38(12)，73-75。
- 盧名瑩(2022)。家庭危險因子、學校依附、個人培力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南市。
- Brumley, L., D., Jaffee, S. R., & Brumley, B. P. (2017). Pathways from childhood adversity to problem behaviors in young adulthoo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dolescents' future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6, 1-14.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 (2), 310-357
- Costello, B. J., & Hope, T. L. (2016). *Peer pressure, peer prevention: The role of friends in crime and conform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Jacobs, J., Agho, K., Stevens, G., & Raphael, B. (2012). Do childhood adversities cluster in predictable ways? A systematic review. *Vulnerable Children and Youth Studies*, 7(2), 103-115.
- Haahr-Pedersen, I., Hyland, P., Hansen, M., Perera, C., Spitz, P., Bramsen, R. H., Vallières, F. (2021). Patterns of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at-risk boys and girls. *Child Abuse & Neglect*, 121, 1-

12.

Liu, L. & Xie, A. (2016). Muddling through school lif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subculture of 'deviant' studen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6, 1-20.

Schafer, M. H., Ferraro, K. F., & Mustillo, S. A. (2011). Children of misfortune: Early adversity and cumulative inequality in perceived life traject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4), 1053-1091.

Trinidad, J. E. (2021). Childhood adversity and deviant peers: Considering behavioral selection and cultural socialization pathways.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21, 1-11.